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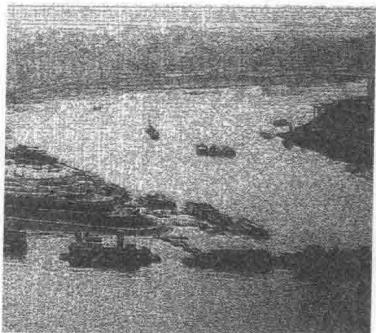
重庆留学史研究

以留学人物·留学政策为中心

(1898—1966)

淳于森冷 潘丽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庆留学史研究

以留学人物·留学政策为中心

(1898—1966)

淳于淼冷 潘丽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庆留学史研究 / 淳于森冷, 潘丽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161 - 5316 - 1

I. ①重… II. ①淳… ②潘… III.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研究—重庆市—近现代 IV. ①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65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李冰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3 年是欧美同学会百年华诞。重庆的广大归国留学人员为了缅怀百年留学史，秉承留学报国、造福家乡的奉献精神，以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梦，在原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欧美同学会会长祝家麟教授的倡议下，决定用回顾重庆留学史的方式来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祝家麟会长的提议得到了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市科委、西南政法大学的大力支持。欧美同学会重庆分会很快就组成了以祝家麟会长、龚卫国常务副会长为组长的“重庆留学史”项目组，并由西南政法大学淳于森泠、梁勇主持申报了重庆市软科学计划项目“重庆文化高地崛起的历史渊源——重庆留学史研究”，正式立项后开始了撰写《重庆留学史研究》的一系列工作。

中国在这百年多的历史上，几次留学热潮的兴起，形成了一支数逾 10 万的留学生群体。这一新型的知识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前辈，有引领科技先锋的学术巨子，也有少数卖国求荣的洋奴；当然，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默默耕耘、勤劳建树的学子们。留学群体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所作所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和对以他们为核心的留学史的研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留学史的研究发端于教育史，主要是因为早期留学归国者从事教育工作的很多，因而引起了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大陆对留学史的研究日益重视，相关专著、论文不断涌现。不过，现有的留学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大叙事等方面，作为某一地区史的研究，尚不多见。

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虽然地处西南内陆，但开埠通商早，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中，重庆人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书写了气贯长虹、可歌可泣的重庆史。而作为重庆历史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庆留学史，虽然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但专门对重庆留学史进行历史性考察、描述和勾画其发展过程，并展示重庆留学人物对重庆社会发展影响的学术成果目前尚未问世，本书在这方面也算是一次新的尝试。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我国留学以来前后五代留学人员的作用和贡献。其中，从1978年改革开放迄今的第五代留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留学大潮，重庆也不例外。面对内容繁复、留学人物众多的重庆留学史，考虑到时间、工作量和难度等因素，本书着重选取了重庆从清末留日热潮到改革开放前的留学史作为研究对象；以重庆留学史的发展过程为纬线，以各个留学时期的重要留学人物、留学政策为经线，力求尽可能清晰地展示重庆留学史的发展过程和重庆留学人物的风采和贡献，让读者对重庆人的出国留学历史有一个较为真实而全面的了解。其中所描述的留学人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重庆籍留学生；第二，在重庆求学由重庆出发出国留学的；第三，在重庆本土做出重大贡献的客籍留学生。全书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重庆学子“负笈东洋”。本部分重点：第一，系统梳理了重庆自清末以来，留学日本的缘起和概况；第二，通过留学人物的描述展示了重庆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第三，邹容及其《革命军》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前期研究成果较多，在此基础上，本部分重点描述了重庆的赵世炎、聂荣臻以及由重庆出发前往法国留学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并寻找救国真理的心路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本部分还对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兴起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以说明任何一种教育都是需要政府财政、公益资金投入的。

第三部分，抗战前后重庆的留学。这一部分，由于重庆在抗战时

期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和著名留学人物的云集重庆，而且中国的出国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留学管理也逐渐规范化。为此，本部分主要立足于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首都的特殊历史地位，着重介绍了中国留学管理政策的发展过程和留学生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历史传承。

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教育。本部分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时代背景对中国留学教育以及重庆留学教育的深刻影响为重点，在分析重庆留学教育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留学教育给予了评价。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还较全面地介绍了重庆留学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情况，整理出了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重庆所培养的留学人才。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在历史叙述中描绘人物；用人物诠释历史，即在重庆留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示重庆留学生的进步性；同时又将重庆留学生置身于社会变革的前沿；既勾勒出了重庆留学史发展的主干线，又突出了重庆优秀留学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对重庆社会进步的突出贡献。

作为一个研究项目，“重庆留学史研究”可以算是基本完成，而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庆留学史，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刚刚起步。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行关注和研究重庆留学史，拙著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甚感欣慰。在此，非常感谢潘洵教授（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鲜于浩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靳明全教授（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任）、周棉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和专业性建议。本书还吸取了学术界不少研究成果的精华，恕未能一一列出，在此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此外，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罗敏、马旭琴、吴蜜、林晓慧、阳芳芳、孙杨、李良萍、黄雪君、杨爱琴以及重庆大学的本科生冀文、吴佳、王睿婕协助了资料的整理、参考文献的编排等，均在此加以说明并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关注地方史的研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吴丽平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提出了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修改意见，对此，项目组全体成员深表

谢意！

本书各章撰写人员是：第一章，淳于森冷、李锋、王维、梅竹、周兴艳；第二章，淳于森冷、梁勇、刘亚晶、申晓敏、刘静；第三章，淳于森冷、郭春甫、类延村；第四章，潘丽霞、岳德顺。

全书的审稿工作由祝家麟会长完成。

由于涉及时间较长、内容繁复，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难免不足，遗漏、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学界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为感！

2013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重庆学子“负笈东洋”	(1)
第一节 新式教育与重庆的留日	(2)
一 清末的留学举措	(2)
二 重庆的新式学堂	(9)
三 重庆留日的概况	(14)
第二节 重庆留日学子的革命活动	(23)
一 邹容及其《革命军》	(23)
二 留日学生与同盟会	(29)
三 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38)
四 为理想献身的留学生	(44)
第三节 留日学生与重庆社会发展	(51)
一 留日学生与现代军事	(52)
二 留日学生与重庆实业	(56)
三 留日学生与重庆教育	(62)
第二章 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70)
第一节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概况	(71)
一 留法俭学与勤工俭学概况	(72)
二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	(77)
三 重庆赴法学生与留学贷款	(84)
第二节 重庆留法学生的求工求学	(90)
一 奔赴法国留学的艰辛	(90)

二 在法勤工俭学的磨砺	(93)
三 “三大运动”的影响	(97)
第三节 重庆留法学生的救助活动	(104)
一 在法国重庆留学生的求助	(104)
二 遣送回重庆留学生的求助	(107)
三 坚持勤工俭学的重庆学子	(110)
第四节 肩负使命的重庆留法学生	(111)
一 加入旅欧党团组织	(111)
二 确立马列主义信仰	(114)
三 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19)
四 学成报国的栋梁之材	(122)
 第三章 抗战前后重庆地区的留学情况	(135)
第一节 抗战前期重庆的留学	(136)
一 留学苏联的政治精英	(136)
二 留学英国、德国、美国	(146)
三 创建重庆第一所高等学府的留学生们	(159)
第二节 战时首都重庆的留学概况	(164)
一 留学教育政策的渐进发展	(164)
二 留学教育政策在重庆实施	(178)
三 战时首都重庆的高教发展	(182)
第三节 留学生对重庆发展的贡献	(184)
一 领导团结抗日救亡	(186)
二 抗战文化繁荣重庆	(193)
三 科技教育奉献重庆	(200)
 第四章 1949—1966 年重庆的留学教育	(211)
第一节 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大背景	(211)
一 国际环境与中国留学教育	(211)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教育的取向	(213)
三 新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概述	(215)

四 留学教育政策的评价	(226)
第二节 重庆执行留学政策概况	(230)
一 重庆的发展与留学教育	(230)
二 重庆对留学政策的执行	(233)
三 重庆留学教育的特征	(236)
第三节 重庆的留苏及东欧等国	(239)
一 留苏教育在重庆	(239)
二 留学东欧等国家	(249)
三 重庆培养的留学人才	(253)
参考文献	(265)
重庆留学史大事记	(280)

第一章

重庆学子“负笈东洋”

清末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内忧外患。为了摆脱危机，走出困境，有识之士希望“教育救国”。清朝廷也试图通过新政及教育改革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1901年，清朝廷在宣布新政时便把“兴学育才”提到了首要地位：“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①而培养“新政”所需人才的途径无外乎有二，一是走出国门到国外学习，二是自己创办新式教育。于是兴办新式学校和鼓励青年人出国留学便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对于清政府来说，兴办新式学校最困难的是匮乏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合格师资和管理人才的不足。如果大批聘请外国教师，不仅费用大，而且也不能保证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清廷认为最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的土人出国留学，尤其是到日本留学”^②。而相对于广大留学生来说，出洋留学则是提升自我、寻求真理、挽救民族危亡的最佳途径。

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华蓥山南麓、扼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口的重庆，“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物萃聚”^③，到清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商业性城市。1891年3月，根据中英《烟台续增专条》重庆成立海关，正式开埠。同时，重庆的传统教育也比较发达，19世纪末，重庆已有不少的书院和私塾，是四川东部的文化教育中心。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4666页。

② 魏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③ 王尔鉴：《巴县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开埠后的重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内、国际的联系交流大大加强，成为留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优秀的重庆儿女、一代留日精英，富于理想、勇于实践，在新式教育、出国留学中施展才华，为沉闷落后的社会、为古老闭塞的山城带来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的留学史话，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第一节 新式教育与重庆的留日

一 清末的留学举措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日本。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堂堂大清帝国惨败于昔日的不庭之国日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国耻，泱泱天朝妄自尊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广大仁人志士急于寻找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清朝廷官僚与士大夫开始理性地反思战败原因，重新冷静地审视日本。当国人把目光转向这个曾几何时对中国亦步亦趋、敬而师之的“蕞尔小国”日本时，人们发现，“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力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①于是，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日本强大的主要原因是注重教育和学习西方。国人开始意识到发展教育和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紧迫性，并认为维新变法后崛起的日本似乎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②

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10天前，“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提交一份请愿书向皇帝建议：“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而成，其必自日本始”，^③力劝清政

^①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③ 《游学门下》，见《约章成案汇览》卷32。

府选拔优秀学生去日本留学。另据《德宗景皇帝实录》记载，光绪皇帝曾下旨要求派遣留学生和鼓励官员出国考察：“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省费，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速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切毋延缓”。^①

另外，当时朝野热衷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度，更符合清当政者的利益，既不动摇清贵族的统治，又可依靠君主立宪来富国强兵，巩固清朝政权。1898年6月至9月清朝廷的“百日维新”，公布了40多项改革的命令，其中包括强调教育改革和公派学生留日，但能够付诸实施的政令很少。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开始逮捕维新的领导者，杨深秀和另外5人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这次政变除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其他少量的改革措施被保留外，改革的大部分计划流产。至于是否废除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举措却没有明确涉及。

改革的失败，使广大进步青年更加认识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纷纷抱着“远涉重洋，入彼学府，采其精英，保我国土”^②的愿望，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学救亡之路。由留日学生主编的《留学生鉴》中称：“朝政之不振，学问之不修，社会之腐败，土地之日狭，强邻之日薄。”^③日本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留学救亡的热点，主要是因为日本在输入西洋文化时取精用弘，成为最早步入西方阵营的东方强国。中国急于拯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人士，将留学东瀛作为学习西洋文化、富国强兵的捷径。1903年第7号中国的《大陆》杂志就道出了广大留学生的声：“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之为便。”

为适应这种形势，一批留日指南的书籍也陆续问世，如《东瀛学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2。

^② 《留东别记》，第3页。转引自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与拒俄运动》，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③ 东京留学生：《留学生鉴》，东京启智书社1903年，第13页。

校举概》、《日本学校述略》、《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执掌》、《留学生鉴》等。它们在介绍留学日本有关事宜的同时，还大力宣传留日与救亡的密切关系，使为救亡而留日的呼声日渐高涨。沉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广大正直青年热切盼望通过留学救国；一批维新人士、封建官僚，也改变了抱残守缺的心态，积极倡导留学日本。

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从巩固清朝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极力主张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透彻地论述了留学日本的意义：“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因此，“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若自欲求精求备，东洋学毕，再赴西洋，有何不可”。^①

张之洞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响应，如梁启超就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术”。^②康有为也指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③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被视为倡导赴日留学的代表人物，“在康梁思想的影响下，总觉得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④当时国内“变法之要求益切，一切新政均须人办理，于是疆吏之奏新政者无不以游学为言”。^⑤一时间，全国营造出了一个留学日本的热潮，从朝廷封疆大臣、部院大臣到普通读书人，“个个莫不以留学的利益来鼓吹来号召”。^⑥1898年，张之洞奏请派遣湖北留日学生并取得成功，成为各省派遣留日学生的表率。

对于广大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除了朝廷的鼓励外，还与中日

^①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诗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78页。

^②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上，741页。

^③ 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7页。

^④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⑤ 舒新成：《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⑥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民国丛书》第1编第48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23页。

两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环境有关。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就官方而言，路途近便，花费少，并便于对留学生进行考察，因而乐于派遣。同样，对于自费留学者来说，路程短，路费少，又能达到留学的目的，留学日本自然是很有诱惑力的。根据《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记载，“到日本航程六天”，而“横渡太平洋花了二十八天”。^①暂且撇开路费不说，单是一个月左右的海上航行就让人几乎不堪承受了，相比之下，赴日之行易于接受得多。另外，出国留学，攻克语言是一大难关。由于日语中有大量的日汉字，故当时人们认为学习日文比学习英文更容易，“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②况且，“日本之文物得自中国者十八九，中国产货无所不有，其席地而坐尤恍惚我之三代，有异乡感无异国感。……而今日之日本其国势且日进，凡中国人之至此者，但有振触爱国之感情，决不至为离乡之悲叹也”。^③

那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鼓动亲朋好友前往日本留学，为留日热潮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地处内陆的四川留日学生也不例外，在报上刊登文章，呼吁家乡同胞不畏艰苦前往日本学习：

……日本以同州同种同文，故思抚东亚共抵西欧，用汲汲焉。举扶桑之文明饷遣我大陆，故自中人留学之属开而内地壮游之士奋一航东渡，数载于兹，卒业者方归，继武者旋至许游学约千人而蜀人不过二十分之一。“合本年来者乃有四十余人”，岂非以不便交通蔽于时事之故耶？

……中国以文明号宇内而学校无专门，故农工商不解新法，人人志科目（小、中、大学无区别，无年限），故少壮老皆误空文且材学究任意授徒，故师不尊而弟愈陋。教科书不编定本，故家为教而人为学。日本不然，各学有专科（如农有农科，工有工科，皆

^①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转引自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②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1899年3月）。

^③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载留日学生自办刊物《游学译编》1903年6期。转引自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由普通入专门学)。

……中国之不强，因人人有倚赖之劣根性。子倚父，弟倚兄，贫者倚亲族，因循自误。志士所讥余热因人，英雄所耻，自古名世莫不从艰苦中来。日本维新诸杰之西游也，附商舶为役夫，藉苦工资学费，大丈夫有志竟成，谁能阻我苦学界中人进步？^①

从1898年开始，留学日本事实上已成为清朝廷的一项国策。朝廷多次号召青年留学，并采取种种奖励政策，如许诺授以各种官职等。1903年10月，根据张之洞的奏请，清朝廷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留用；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日本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还给予翰林升阶。这实际上给热衷于仕途的青年们开辟了另一条便利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路没有了，但留学又开辟了新的仕途之路。于是，不少读书人都以出洋留学作为仕途发展的一条重要捷径。清朝廷对回国留学生采用的赏出身、授官职的奖励办法虽然被世人讥讽为“洋科举”，但在当时无疑激发了广大青年留学的积极性。

除了升官进爵的奖励外，财政不足的清朝还鼓励自费留学。张之洞、刘坤一等也鼓励各省人士自费出洋游学，毕业回国后给以同等待遇。由于清政府对自费留学资格不加限制，不问出身，不论学历，自费留学人数自然迅速增加，并超过了官费人数。1903年，清朝廷下令自费留学生只要家长报名，通过省学务处考试，就可以领取咨文出国，办事人员不准刁难勒索。后来又补充规定自费生若考入外国大学也可以转为官费培养。自费生如果经费不足或因病住院，国家亦可酌情给予补助。

除了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教育，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援助外，留学日本在当时蔚然成风还与日本方面的积极态度有关。日本一些文武大

^① 《鹭江报》，汇论：《留学日本四川同乡会敬致蜀人劝游学启》，1903年，第43册。

员不时游说中国政府要派遣学生留学日本。1898年，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致函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知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我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①该建议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一些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官办学校在日本陆续创办。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同时又能缓解日本国内教育资源不足的困境，日本官方还向清政府建议推行留日速成教育。据吴汝伦《函札笔谈》记载，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菊池大麓向其建议：“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之法。”^②除日本官方外，日本民间人士也积极游说。朱必谦（朱蕴章）是重庆首批官费留日学生，1899年，他陪同四川总督奎俊所派遣的武官丁鸿臣、文官沈澜清赴日本考察，了解先期赴日的中国留学生情况。据他回忆：“不久（1900年）井户辰三亦来，即上成都与川督奎俊商洽，除聘日本武官为武备学堂教习外，并允先派学生前赴日本肄业。事关初举，必须奏请立案。井户辰三返渝告我，业已允派学生，其定额为二十人。”^③在井户辰三的多次建议下，四川总督奎俊先后派遣候补道员周善培等官员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学校、警政、兵政等情况，并多次派员留日考察留学事务，为派遣留日学生作准备。当然，日本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张其实力。如当时日本的舆论就希望：“支那既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机荣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④

对于新政急需的人才，清朝廷则采用速成留学的措施。如兴办新式教育所需要的师资和准备实行宪政所需要的政治、法律。另外，针对留日的发展情况，清朝廷也改变了洋务运动时期单一的官派方式，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与自费并举的方针。中央各部、地方各省，以及各

^①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② 吴汝伦：《函札笔谈》，《东游丛录》，东京三省堂1902年版，第38页。

^③ 朱必谦：《对〈四川学生官费留日考订〉之商榷》，《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8页。

^④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